

#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sup>\*</sup>

□ 许为宾 陈 叶 豆秋杰 李 欢

领域编辑推荐语：

“本文从烙印理论出发，系统考察企业家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文章有助于理解中国制度情境下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的决策逻辑。”

——李炜文

**摘 要：**企业家成长经历会对企业家个人及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烙印理论，着重考察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并以2002~2014年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对企业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②企业家的高等教育经历和体制内工作经历会显著削弱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③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办的企业和产权保护情况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④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偏好影响较大，对家族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本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偏好家族化控制的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解构逻辑，也进一步丰富了烙印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城乡二元体制；烙印理论；农村成长经历；家族控制权偏好

## 一、引言

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家的作用。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三农”这片肥沃的土壤。有相当一批民营企业企业家从农村走出来，与农村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们通过创办企业促进了乡村经

---

\*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历史的延续：家族涉入的家族化起源依赖与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2262006）和“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社会阶层烙印与企业投资‘脱实向虚’”（项目编号：71862006）的资助。感谢各位编辑老师以及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使本文质量有显著的提高。

济发展,甚至成为民营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鲁冠球、刘永好、曹德旺等。引人注目的是,成长于农村的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绝大多数由家族控股,并由家族成员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形成了以宗亲关系为导向的权力配置方式,逐渐发展成一套有别于西方家族企业的高度家族化治理模式(郑家喜和蔡根女,2004)。例如,鲁冠球于1992年通过“花钱买不管”的方式与政府明晰产权,获得了家族对万向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又如成长于农村的曹德旺在通过河仁基金实现家族企业股权捐赠的同时,明确要求保留家族企业控制权。

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对于控制权有着天生的偏爱,因为控制权的创造性运用是企业获取价值或创造企业家利润的重要工具(陈德球等,2013)。有研究发现,地区法律效率和金融深化程度(陈德球等,2013)、制度环境(连燕玲等,2012)、股权制衡度(钱爱民和吴春天,2023)等能够影响家族控制权偏好。另外,有研究从企业家自身资源禀赋层面来研究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比如,有研究发现,具有“资本家”禀赋的企业家倾向于设计复杂的控制权结构(蓝发钦等,2016),创始企业家的身份资本会加剧企业家对控制权的争夺(曾宪聚等,2019)。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鲜少有研究从企业家的过往经历出发来研究企业家控制权偏好。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不能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上述这种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强化对企业高度家族化控制的现象只是个案现象还是一种普适性现象?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将企业家族化(家庭化)的原因何在?本文将将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应用

烙印理论,研究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

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是企业的主要塑造者和掌舵者,其行为意图更多的是其个体意志的体现(乔耀章和巩建青,2014)。因此,理解企业家个体意志是揭示家族控制权偏好前置动因的关键,而企业家个体意志形成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现有研究表明,早期经历对个体意志偏好有着深远的影响(Cote,2011)。即使在个体经历了客观的成功和转变生活环境后,早期经历的影响依然存在(Kish-Gephart et al.,2015)。关于企业家成长经历这一话题,现有研究已较为丰富,分别对企业家职业经历、学术经历、海外经历、从军经历等进行了广泛关注,这些经历的“独特性”“可区分性”能够很好地解释企业家早期经历对企业家意志的影响。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虽然“企业家”这个词常常会让人联想到拥有丰富社会物质资源的高阶层群体,但是企业家客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可能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企业家早年成长经历中都拥有相同的社会物质资源和文化环境。

为应对上述现实需要与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聚焦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聚焦于此主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特有且影响深远的社会管理制度;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反映的是社会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个体生活文化情景上的差异(陆益龙,2008;于潇和Ho,2016;Kraus & Stephens,2012)。

本文以2002~2014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如下几点:第一,具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尤其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没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群体中这一关系更显著；第二，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办的企业，以及产权保护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三，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偏好影响较大，对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的研究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拓展了家族控制权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基于烙印理论，研究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从理论前沿角度重新描述了从“企业家个体意志”到“企业权力配置行为”的主导逻辑。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家的短期或突发性经历，这些经历帮助他们吸取经验，但这些经验可能很快被新的经验所替代，或因环境变化而不适用。相比之下，本文关注的农村成长经历是长期且常态化的物质匮乏经历，能够塑造企业家的思维认知，持续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而不易被环境和经历改变。通过深入探讨这种长期经历对企业家控制权偏好的影响，本文为家族企业控制权偏好的产生动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构逻辑。二是从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家族企业家族化原因。本文聚焦于企业家的农村成长经历，从企业家早期的社会物质资源、传统文化情境以及社会资本方面来解释家族企业家族化的原因。这一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化动因、推进家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拓展了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控制权配置方面的差异，假设家族企业之间是同质

化的。然而，由于资源禀赋、企业家特质等方面的差异，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结构和行为上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本文聚焦家族企业群体，深入地揭示了家族企业因企业家成长经历差异而呈现出的家族控制权差异，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家族企业之间差异化的控制权配置行为。

##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制度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为加快工业化建设并实现赶超目标，国家先后建立了统购统销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乔耀章和巩建青，2014）。其标志性特征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此基础上，国家逐步建立起二元户籍制度，将整个社会群体分为两类：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这种二元户籍制度造就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派生出的二元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进一步加深了城乡之间的分割局面，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固化（乔耀章和巩建青，2014）。

城乡二元体制背后是社会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以及城乡个体生活文化情境的差异（陆益龙，2008；于潇和Ho，2016；Kraus & Stephens，2012），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农民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社会保障方面，城市具有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几乎全部依靠农民自己（杨翠迎和王润泉，2016）；教育方面，长期实行的政府保障城

市学校办学政策，使教育资源偏向城市，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张旺，2012）；精神文化方面，宗亲文化传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消解程度相对较高，城市人口在市场经济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竞争、创新、开放的精神理念，而在农村地区，乡土社会中较浓重的宗亲观念相对于城市而言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由于经历的相似性，会形成区别于其他社会圈层群体的认知倾向，这也正是城乡个体之间表现出较大意志偏好及认知差异的原因。

## （二）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

早年成长经历会影响企业家个体的意志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相关决策行为。例如，企业家的从军经历、贫困经历、学术经历等都会影响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从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性决策行为。农村成长经历作为一种能够反映企业家早年生活处境的特殊经历，同样会影响企业家的个人意志偏好，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在研究决策者意志偏好对其决策行为影响的文献中，一些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主要采用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等来指代企业家个体意志差异，这导致了过长的因果链条和难以解释的“人口学背景黑箱”问题。与高阶梯队理论不同，烙印理论关注决策主体的早期经历如何塑造其心理特质，并强调这些心理特质形成的历史渊源、环境匹配性以及特质烙印的长期稳定性。本文侧重于揭示企业家早期农村成长环境如何塑造其心理认知，并进一步探讨其心理认知如何影响其家族控制权偏好。因此，本文主要基于烙印理论进行分析。

烙印理论认为，组织或个体在发展过程中

会经历若干敏感时期，形成与特定环境相匹配的特征烙印。这些特征烙印具有长期稳定性，持续影响着组织或个体的后期行为。即使行为主体所处环境发生变化，早期经历所形成的特征烙印也会继续发挥作用（Kraus & Stephens, 2012）。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城乡群体之间在社会物质资源、传统文化情境乃至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会影响其控制权偏好。具体如下：

首先，从企业家个体早期所拥有的社会物质资源情况来看：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向城市倾斜，使成长于城市的个体拥有相对宽松的物质保障，在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并具有身为“城里人”的优越感。长期宽松的物质资源保障和较高的地位感知使其心理安全性较高。相反，成长于农村的个体在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长期的物质资源约束及较低的社会地位会使其心理安全性较低（徐富明等，2017），增强其威胁敏感度，降低其控制能力（郑红亮和吕建云，2008），进而导致其对自身资源流失更加敏感，更加注重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和控制（解晓娜和李小平，2018）。同时，长期的资源约束还会导致其对稀缺资源产生“稀缺心态”（Graham et al., 2015）。心理学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发现，个体长期处在特定环境中会受到他人行为和观念的影响，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Bandura, 1989）。因此，农村个体的上述心理认知偏好会根深蒂固地刻入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更加注重对自身财富和权力的保护和控制。根据烙印理论，这种在早期农村成长环境中形成

的心理认知烙印具有长期稳定性，会持续影响企业家后期的决策行为。在家族企业中，这表现为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家族企业家会强化对企业的家族化控制。

其次，从城乡个体早期所经历的传统文​​化情境来看：“以家为本”的宗族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宗族文化传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消解程度相对较高。虽然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相对落后封闭，但是这也使农村社会中的宗族文化传统相对于城市而言得到了较好的延续（胡荣和胡康，2008）。农村地区保留了传统的宗族文化理念，人们具有更强烈的宗亲意识。潘越等（2019）研究认为：传承千年的宗族文化能够内化成企业实际控制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并通过非正式契约将个人和企业联结在一起，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现有研究认为，文化传统具有“先验”特征，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想认知，包括成长于此环境中的企业家的思想认知（辛杰，2014）。相对于成长于城市的企业家而言，成长于农村的企业家受到传统宗族文化熏陶的程度更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使其发展出一种与宗族文化传统相契合的“性格”。当企业家的宗族观念较强时，其对家族成员的信任程度远高于外人，使其在企业关键管理人员的安排方面更倾向于任用亲人（吴超鹏等，2019）。同时，宗族观念强烈的企业家更希望家族企业能够世代传承，因此会尽可能保持较高的公司控制权，以利于将来把企业传承给家族二代（Schoar，2006）。根据烙印理论，农村个体在成长过程中

会形成浓厚的与宗族文化相匹配的特征烙印，他们对家族成员的信任程度远高于外人，进而导致其对企业进行家族化控制的偏好程度也更高。

最后，从城乡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来看：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下，城乡个体在社会资本构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胡荣和胡康，2008）。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个体或组织与外界联系的密度、广度，以及相互之间的互惠和信任程度（Stephen & Philip，1997）。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个体生活更多地与单位同事及其工作相关人员进行社会交往，形成非宗亲的社会关系网络。相比之下，农村个体与这些人交往相对较少，导致其对领导同事和弱关系人群的信任程度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农村社会中，宗亲密友和婚姻关系构成了主要的社交关系。农村个体的宗亲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密切程度远高于城市个体，使其对宗亲密友的信任程度更高（胡荣和胡康，2008）。依据烙印理论，早期农村成长环境所塑造的个体对宗亲密友的信任偏好特质，会长期持续地影响其个体决策行为。这就是使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在创业时期所能够给予更高信任和选用的人员对象更有可能是宗亲密友。因此，在客观层面上呈现出对企业较高的家族化控制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对企业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

### （三）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影响

烙印理论指出，行为主体会经历多个环境敏感期，并被刻上与环境相匹配的烙印特征。同时，后期的烙印会不断覆盖之前的烙印，进

而使个体的思维认知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 (Marquis & Tilcsik, 2013)。接受高等教育和入职体制内单位能够实现从“农业”户籍向“非农业”户籍的转化,并伴随着物质环境改变。因此,学习(接受高等教育)和工作(入职体制内单位)经历承载着农村个体的命运转折点,所带来的新的物质环境会给农村个体刻上新的烙印,进而使其形成新的思想认知。那么,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否会影响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的思想认知,进而影响其控制权偏好,就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1. 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

接受高等教育是个体在社会层面实现向上流动的最好途径之一,有助于使个体跨越社会身份障碍(刘宏伟和刘元芳,2013)。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个体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农业”户籍向“非农业”户籍的转变(赵西亮,2017)。高等教育是表征个人社会地位的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生活境况的变化(汪建华,2011)。

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后,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城市户口,经济收入和福利保障等都会有相应地改善,且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构建起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诸如同学和校友等社会资源。一方面,这些资源越丰富,决策者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对决策后果的乐观程度越高(陈东,2015)。因此,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个体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的物质资源改善,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风险敏感性,提升其心理安全性。另一方面,所能够获取的资源越丰富,个体对资源的“稀缺心态”也能够得到缓解。此外,个体所处的

外部物质环境的改善会影响其社会关系中所接触的个体,从而对其心理安全性和对稀缺资源的认知产生影响,进而逐渐改变个体对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Bandura,1989)。因此,接受高等教育会改变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对待权利和财富的思维认知,进而缓解其家族控制权偏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 2. 工作经历的影响

从个体成长发展历程来看,工作经历对个体成长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会对个体产生长久的职业“烙印”效应(McEvily et al., 2012)。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就业单位以体制划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组织形式(Han et al., 2014)。体制内工作经历能够影响个体形成新的认知偏好。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实际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曾经在体制内单位工作。这种工作经历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会覆盖其早期农村成长经历所形成的烙印,进而影响其家族控制权偏好,具体如下:

首先,对于出身农村家庭的个体来说,进入拥有“铁饭碗”工作的体制内单位相当于实现了“鲤鱼跳龙门”,在社会身份上就实现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其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物质条件会得到改善(韩亦和郑恩营,2018)。体制内单位良好的物质保障,使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体制内单位有着较高的认可度的情况,这会使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职业身份认同。体制内个体可以凭借单位平台构建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一定的

社会资本收益 (Li et al., 2008)。物质和社会资源越丰富，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其心理安全程度更高 (陈东, 2015)，进而有助于缓解其农村成长经历所形成的风险敏感性和对资源的“稀缺心态”。

其次，个体进入体制内的相关单位工作后，会接受一系列的职业教育，其中包含大量现代管理文化理念。体制内一般会建立成体系的工作协调机制、监督机构及约束机制、相对完备的决策程序与规范。这种现代管理文化理念的熏陶和程序化工作氛围，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个体所承受的家族主义文化传统理念的影响，进而弱化其家族控制权偏好。

最后，当个体进入体制内工作后，个体接触到新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学习环境，与其他不同背景的人交往，这些经历可能导致他们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Bandura, 1989)。因此，进入体制内工作会改变个体的思维认知，进而改变他们的控制权偏好。综上所述，体制内工作经历能够削弱农村成长经历对企业家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体制内工作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 (四) 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控制权配置不可能脱离外在的制度约束，它总是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 (Young & Salih, 2014)。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来看，1992年中国社会开启了市场化转型全面进程，制度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家的风险敏感性和权力偏好。基于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经济体

制确立，以及地区产权保护的影响。

##### 1. 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1992年以前，一方面，国家给予私营企业的制度支持很少，企业家能争取到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流社会群体主要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该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认同度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家获取资源支持的难度。

党的十四大会议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国家逐步出台了许多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经济收入对个体地位感知的影响越来越大 (李路路等, 2018)。行政体系对私营企业家身份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许多私营企业家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社会主流对民营企业企业家身份的正面评价越发积极，“万元户”“企业家”等称呼取代“个体户”“暴发户”成为其新的社会标签 (柳珊, 2012)。这使这一时期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认同和阶层地位得到了较大提高，有利于企业家积累社会资本，从而获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资源禀赋的变化提高了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心里安全性，缓解了其对资源的“稀缺心态”。此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善了企业经营的政策环境，加大了对企业的资源支持，为企业家们提供了积累更多更高社会资本的机会。在更开放的环境中与更多元化的个体交往，这些经历可能导致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Bandura, 1989)，使他们更倾向于与他人合作、分享资源，减少对资源的过度控制，从而削弱他们的控制权偏好。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会削弱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 2. 地区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一,导致企业产权的保护水平也不同。在制度保护薄弱的地区,对企业的侵害行为可能不会受到法律惩罚(La Porta et al., 2000),致使企业财产安全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增加企业家对产权的担忧和控制欲望(Tsao et al., 2009)。在制度保护较强的地区,政府和特权阶层对私人财产的侵占行为会受到限制,企业财产权利更加安全,减轻了企业家对产权的“稀缺心态”,进而缓解了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此外,强有力的产权制度为交易提供了有序、高效、公平和可预测的环境(Judge et al., 2008),使企业家更自由、安全地与不同背景的合作伙伴接触并进行交易和合作,从而更容易获得所需的资源。多元化的社会交往和合作可以让企业家获取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的知识、技能和资源(赵武等, 2022),有助于改变企业家的思维认知(Bandura, 1989),使其更开放、合作和适应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从而缓解企业家对控制权的偏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 强化产权保护有助于削弱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02~2014年中央统

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该调查每2年进行一次,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类私营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问卷中关于企业家身份特征和权力配置等方面的数据均来自企业家本人的回答,数据更有针对性。参照何轩等(2016)的研究,在总样本中,本文以企业家及其家人持股50%的企业为家族企业样本。样本经过以下程序处理:剔除了数据缺失、明显异常及公共事业类、金融行业类的样本公司。然后,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 缩尾处理,最终得到7594家企业样本,其中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的样本数分别为1028、1087、965、1051、1230、1081。

#### (二) 变量界定

##### 1. 被解释变量

家族控制权偏好(Family Control Power, FCP)。本文参考Villalonga和Amit(2009)研究从所有权、决策控制权和管理权三个方面对家族控制权偏好进行度量。

所有权(Equity)是企业权力结构中最基础的权力,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家的所有权控制越强。我们以67%的持股比例作为是否绝对控股的标准,企业家及其家人持股67%以上赋值为1,否则为0。

决策控制权(Decision),采用问卷调查项目中“您企业的重大决策由谁做出?”进行测量,如果回答“由本人(出资人)作出”或者在“其他”中补充说明“由家庭成员作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管理权(Manage),采用问卷调查项目中

“企业日常管理由谁负责?”进行测量，如果回答“由本人（出资人）作出”或者在“其他中补充说明由家庭成员作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以上四个维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强度，但是每个指标单独使用都有局限性，不够全面。参考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的研究思路，在上述基本测量的基础上，采用两种方法构建家族控制权偏好的综合指标：一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三个指标提取一个公因子（*FCP1*）；二是将上述三个虚拟变量直接相加求平均值（*FCP2*）（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FCP1* 指标通过统计方法考虑了不同维度的权重，而 *FCP2* 没有考虑不同维度的权重，所有维度按照等权处理。上述指标数值越大，代表企业家对企业的家族控制权偏好越强。

## 2. 解释变量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Rural*）。以企业家是否具有农村成长经历作为衡量指标，根据全国私营企业调查表中：“您在开办私营企业前的主要经历……”调查问项，该题项的答案为多选题，选项中包括：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担任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曾经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作（担任管理者还是一般工人）；曾经在外资企业工作（担任管理者还是一般工人）；曾经在私营企业工作（担任管理者还是一般工人）；曾经在农村工作（村干部、农民、打工）；以及其他等。如果被调查者只选择了创业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为主要经历，如“工人”等经历，而没有选择“农民”经历，那么该调查者出身于农村家庭的

可能性不大。或者被调查者创业前工作经历既有“农民”，也有其他经历，如“工人”经历等，那么依据我国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看，凡是没有过“农民”经历的出身于农村家庭的可能性不大，而有过“农民”经历的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农村家庭（我们排除了派驻到村里担任村干部或者在农村短暂打工等选项），并不会因为其创业前为“工人”就忽略掉其出身于农村家庭，表明其具有农村成长经历。因此，凡是创业前有“农民”经历的赋值为1，否则为0。

## 3. 调节变量

受高等教育经历（*Edu*），以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为测量标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赋值为1，否则为0。

体制内工作经历（*System*）。参照戴维奇等研究，创业前有过在党政机关以及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作经历，赋值为1，否则为0。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Market*），参照邹立凯等研究，以企业实际创办年份进行测度，企业创办时间为1993年以后赋值为1，否则为0。

产权保护水平（*Property*），参考杨瑞龙等研究，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分项得分进行测量。

## 4.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企业年龄、政治关联、行业身份、企业家年龄、企业家性别、地区经济状况；此外，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家族控制权偏好	<i>FCP1</i>	所有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三个虚拟变量的主成分合成指标
	<i>FCP2</i>	所有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三个虚拟变量的平均值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i>Rural</i>	具有农村经历的取值为 1，否则为 0
高等教育经历	<i>Edu</i>	大专以上学历为 1，否则为 0
体制内工作经历	<i>System</i>	创业前在体制内工作的为 1，否则为 0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i>Market</i>	企业创办时间为 1993 年以后赋值为 1，否则为 0
产权保护水平	<i>Property</i>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
企业规模	<i>Size</i>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i>Leverage</i>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i>Ros</i>	净利润/销售总额
企业年龄	<i>Firm-Age</i>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注册年份再取自然对数
政治关联	<i>PC_dum</i>	企业家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行业身份	<i>Member</i>	企业是否工商联成员，是则为 1，否则为 0
企业家年龄	<i>Age</i>	企业家实际年龄的自然对数
企业家性别	<i>Gender</i>	性别为男性，取值为 1，否则为 0
地区经济状况	<i>GDP</i>	地区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所在行业	<i>Industry</i>	行业哑变量
年度	<i>Year</i>	年度哑变量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 和 *FCP2*) 的均值分别是 0.002 和 0.455，标准差分别为 0.001 和 0.314，表明不同企业家的家族控制权偏好水平

存在一定差异。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的均值为 0.297，标准差为 0.457，表明样本企业中有 29.7% 的企业家具有农村成长经历。高等教育经历的均值为 0.481，标准差为 0.500。体制内工作经历的均值为 0.410，标准差为 0.492，表明样本中有 41% 的企业家创业前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这可能和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官员下海”潮有较大关系，其他变量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Sd	Min	P <sub>25</sub>	P <sub>50</sub>	P <sub>75</sub>	Max
<i>FCP1</i>	0.002	0.001	-1.801	-0.632	-0.612	1.420	1.813
<i>FCP2</i>	0.455	0.314	0.000	0.333	0.333	0.667	1.000
<i>Rural</i>	0.297	0.457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i>Edu</i>	0.481	0.500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续表

变量	Mean	Sd	Min	P <sub>25</sub>	P <sub>50</sub>	P <sub>75</sub>	Max
<i>System</i>	0.410	0.492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i>Time</i>	0.826	0.379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Propety</i>	7.456	1.653	1.850	6.400	7.780	8.150	10.650
<i>Size</i>	6.097	2.031	0.000	4.605	6.109	7.438	14.170
<i>Leverage</i>	0.004	0.013	0.000	0.000	0.002	0.005	0.500
<i>Ros</i>	0.013	0.047	0.000	0.000	0.001	0.002	0.660
<i>Firm-Age</i>	2.127	0.653	0.000	1.792	2.197	2.565	3.664
<i>PC_dum</i>	0.451	0.498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i>Member</i>	0.699	0.459	0.000	0.000	1.000	1.000	1.000
<i>Age</i>	3.811	0.182	2.996	3.689	3.829	3.951	4.190
<i>Gender</i>	0.875	0.331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GDP</i>	3.271	2.248	0.326	1.437	2.881	4.735	10.520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单变量检验结果。两样本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分别基于参数 t 检验和 Wilcoxon 检验。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

业家样本组的家族控制权偏好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不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样本组，初步验证了假设 H1。

表 3 单变量分析结果

变量	没有农村经历 (N = 5336)		具有农村经历 (N = 2258)		(1) - (3)	(2) - (4)
	(1)	(2)	(3)	(4)		
	Mean	Median	Mean	Median		
<i>FCP1</i>	-0.019	-0.612	0.052	-0.238	-0.071***	-0.374***
<i>FCP2</i>	0.445	0.000	0.478	0.333	-0.033***	-0.333***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二) 统计检验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 OLS 回归对假设 1 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第 (1) 列、第 (4) 列呈现的是未加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第 (2) 列、第 (5) 列是添加了相关控制变量但未控制年份和行业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估值系数都是正向显著。加入行业 and 年份控制变量后，表 4

第 (3) 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 的估值系数为 0.090，且在 0.1% 水平上显著；在表 4 第 (6) 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2*) 的估值系数为 0.035，且在 0.1% 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具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假设 1 得到支持。

表 4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变量	(1) FCP1	(2) FCP1	(3) FCP1	(4) FCP2	(5) FCP2	(6) FCP2
常数项	-0.019 (-1.405)	-0.096 (-0.406)	0.085 (0.390)	0.445*** (4.671)	0.496*** (6.684)	0.537*** (7.333)
<i>Rural</i>	0.071** (2.828)	0.073** (2.935)	0.090*** (3.788)	0.032*** (4.036)	0.032*** (3.968)	0.035*** (4.285)
<i>Size</i>		-0.002 (-0.403)	-0.001 (-0.142)		-0.002 (-1.072)	-0.001 (-0.807)
<i>Leverage</i>		-2.289 (-1.104)	0.909 (0.452)		-3.403*** (-4.722)	-3.805*** (-5.342)
<i>Ros</i>		1.829*** (7.204)	0.335+ (1.501)		-0.022 (-0.283)	-0.207** (-2.761)
<i>Firm-Age</i>		0.009 (0.512)	-0.008 (-0.433)		0.004 (0.630)	0.011 (1.903)
<i>PC_dum</i>		-0.005 (-0.218)	0.014 (0.604)		0.000 (0.036)	0.005 (0.700)
<i>Member</i>		-0.345*** (-5.562)	-0.053* (-2.092)		-0.084*** (-9.601)	-0.049*** (-5.568)
<i>Age</i>		0.010 (0.155)	-0.099 (-1.720)		-0.006+ (-0.307)	-0.018 (-0.924)
<i>Gender</i>		-0.019 (-0.563)	0.040 (1.333)		0.002 (0.173)	0.010 (0.954)
<i>GDP</i>		0.085*** (7.061)	0.006 (0.893)		0.014*** (8.550)	0.003 (1.427)
<i>Ind/Year</i>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F	8.100	6.680	8.660	7.790	7.050	4.310
Adj R <sup>2</sup>	0.079	0.083	0.157	0.084	0.095	0.099
N	7594	7594	7594	7594	7594	7594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5 是关于高等教育经历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 5 第 (1) 列、第 (4) 列中,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高等教育经历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高等教育经历显著削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 分组检验结果表明,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组中, 表 5 第 (2) 列、第 (5) 列显示,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032 和 0.017, 均不显著。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组中, 表 5 第 (3) 列、第 (6) 列显示,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157 和 0.056, 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

向关系，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 组中更显著，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5 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

变量	(1) FCP1 全样本	(2) FCP1 Edu=1	(3) FCP1 Edu=0	(4) FCP2 全样本	(5) FCP2 Edu=1	(6) FCP2 Edu=0
常数项	0.079 (0.361)	-0.200 (-0.648)	0.174 (0.570)	0.541 *** (7.360)	0.478 *** (4.443)	0.590 *** (5.849)
Rural	0.092 *** (3.907)	0.032 (0.968)	0.157 *** (4.603)	0.035 *** (4.330)	0.017 (1.405)	0.056 *** (4.951)
Rural×Edu	-0.120 ** (-2.694)			-0.034 * (-2.181)		
Edu	-0.129 *** (-5.404)			-0.020 * (-2.401)		
Size	-0.001 (-0.108)	-0.003 (-0.372)	-0.000 (-0.027)	-0.001 (-0.760)	-0.003 (-1.009)	-0.001 (-0.389)
Leverage	0.704 (0.353)	-0.143 + (-0.055)	2.119 (0.690)	-3.851 *** (-5.402)	-2.520 ** (-2.612)	-4.825 *** (-4.562)
Ros	0.328 (1.468)	0.803 * (2.194)	0.002 (0.006)	-0.206 ** (-2.741)	-0.227 (-1.696)	-0.207 * (-2.286)
Firm-Age	-0.005 (-0.273)	0.011 (0.464)	-0.004 (-0.150)	0.012 * (2.003)	0.017 * (2.135)	0.011 + (1.264)
PC_dum	0.004 (0.171)	0.067 * (2.147)	-0.062 (-1.899)	0.004 (0.481)	0.016 (1.424)	-0.009 (-0.827)
Member	-0.059 * (-2.324)	-0.016 (-0.465)	-0.112 ** (-2.948)	-0.051 *** (-5.709)	-0.031 * (-2.496)	-0.071 *** (-5.579)
Age	-0.093 (-1.624)	-0.070 (-0.861)	-0.098 (-1.201)	-0.017 (-0.867)	-0.004 (-0.130)	-0.027 (-1.013)
Gender	0.045 (1.508)	0.004 (0.086)	0.080 (1.958)	0.011 (1.033)	0.016 (0.976)	0.010 (0.728)
GDP	0.015 * (2.194)	0.045 *** (4.639)	-0.005 (-0.544)	0.005 (1.904)	0.009 * (2.302)	0.002 (0.549)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6.120	3.020	5.250	3.030	5.490	4.150
Adj R <sup>2</sup>	0.161	0.109	0.109	0.100	0.094	0.119
N	7594	3672	3922	7594	3672	3922
系数差异		0.125			0.039	
Chi2		5.300			4.660	
p-value		0.021			0.031	

注：+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6 是关于体制内工作经历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 6 第 (1) 列、第 (4) 列中,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体制内工作经历显著削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 分组检验结果表明, 有过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样本组中, 表 6 第 (2) 列、第 (5) 列显示,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012 和 0.010, 均不显著。没有过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样本组中, 表 6 第 (3) 列、第 (6) 列显示,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135 和 0.049, 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的影响在没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样本组中更显著, 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6 体制内工作经历的影响

变量	(1) <i>FCP1</i> 全样本	(2) <i>FCP1</i> System=1	(3) <i>FCP1</i> System=0	(4) <i>FCP2</i> 全样本	(5) <i>FCP2</i> System=1	(6) <i>FCP2</i> System=0
常数项	0.098 (0.447)	0.243 (0.691)	-0.014 (-0.051)	0.560*** (7.650)	0.690*** (6.048)	0.480*** (4.985)
<i>Rural</i>	0.088*** (3.710)	0.012 (0.335)	0.135*** (4.326)	0.033*** (4.163)	0.010 (0.857)	0.049*** (4.488)
<i>Rural</i> × <i>System</i>	-0.111* (-2.412)			-0.038* (-2.436)		
<i>System</i>	-0.045 (-1.765)			-0.063*** (-7.203)		
<i>Size</i>	-0.001 (-0.137)	-0.010 (-1.152)	0.004 (0.580)	-0.001 (-0.792)	-0.004 (-1.488)	0.000 (0.015)
<i>Leverage</i>	1.175 (0.584)	0.289 (0.121)	2.751 (0.734)	-3.485*** (-4.931)	-2.781*** (-3.370)	-5.154*** (-3.796)
<i>Ros</i>	0.338+ (1.513)	0.237 (0.541)	0.386+ (1.468)	-0.212** (-2.826)	-0.211+ (-1.693)	-0.196* (-2.128)
<i>Firm-Age</i>	-0.008+ (-0.464)	-0.007 (-0.269)	-0.007+ (-0.297)	0.011 (1.927)	0.002+ (0.225)	0.018* (2.263)
<i>PC_dum</i>	0.015 (0.652)	0.045 (1.332)	-0.008 (-0.274)	0.006 (0.763)	0.008 (0.669)	0.004 (0.424)
<i>Member</i>	-0.050* (-1.989)	-0.036 (-0.901)	-0.061 (-1.861)	-0.047*** (-5.342)	-0.027* (-1.965)	-0.060*** (-5.100)
<i>Age</i>	-0.095 (-1.649)	-0.126 (-1.358)	-0.073 (-0.989)	-0.017 (-0.868)	-0.044 (-1.491)	0.002 (0.068)
<i>Gender</i>	0.040 (1.331)	0.009 (0.184)	0.059 (1.558)	0.010 (0.977)	-0.005 (-0.287)	0.021 (1.583)

续表

变量	(1) FCP1 全样本	(2) FCP1 System=1	(3) FCP1 System=0	(4) FCP2 全样本	(5) FCP2 System=1	(6) FCP2 System=0
GDP	0.007 (1.109)	-0.004 (-0.364)	0.010 (1.225)	0.004 (1.848)	-0.002 (-0.513)	0.007** (2.634)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3.110	2.140	2.880	2.850	6.360	8.030
Adj R <sup>2</sup>	0.159	0.182	0.184	0.110	0.096	0.121
N	7594	3114	4480	7594	3114	4480
系数差异		0.123			0.039	
Chi2		5.450			10.390	
p-value		0.020			0.001	

注：+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7 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 7 第 (1) 列、第 (4) 列中，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显著削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经济确立之前的样本组中，表 7 第 (2) 列、第 (5) 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

*FCP2*)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238 和 0.096，均在 1% 水平上显著。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样本组中，表 7 第 (3) 列、第 (6) 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052 和 0.021，均在 5%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的样本组中更显著，假设 H4 得到验证。

表 7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影响

变量	(1) FCP1 全样本	(2) FCP1 Market=0	(3) FCP1 Market=1	(4) FCP2 全样本	(5) FCP2 Market=0	(6) FCP2 Market=1
常数项	0.097 (0.446)	0.844 (1.320)	-0.028 (-0.119)	0.544*** (7.419)	0.666** (3.231)	0.518*** (6.488)
<i>Rural</i>	0.086*** (3.641)	0.238*** (4.142)	0.052* (1.987)	0.033*** (4.065)	0.096*** (5.082)	0.021* (2.319)
<i>Rural</i> × <i>Market</i>	-0.158** (-2.670)			-0.071*** (-3.526)		
<i>Market</i>	-0.009 (-0.229)			-0.005 (0.389)		
<i>Size</i>	-0.001 (-0.112)	-0.005 (-0.308)	-0.000 (-0.072)	-0.001 (-0.759)	0.001 (0.161)	-0.002 (-0.836)

续表

变量	(1) FCP1 全样本	(2) FCP1 Market=0	(3) FCP1 Market=1	(4) FCP2 全样本	(5) FCP2 Market=0	(6) FCP2 Market=1
<i>Leverage</i>	1.048 (0.522)	2.968 (0.774)	0.525 (0.222)	-3.734*** (-5.241)	-2.021 (-1.491)	-4.270*** (-5.342)
<i>Ros</i>	0.315 (1.409)	0.597 (0.803)	0.278 (1.186)	-0.218** (-2.910)	-0.154 (-0.644)	-0.226** (-2.765)
<i>Firm-Age</i>	-0.020 (-0.920)	-0.092 (-0.982)	-0.023 (-1.005)	0.002 (0.334)	0.009 (0.303)	-0.000 (-0.052)
<i>PC_dum</i>	0.014 (0.612)	0.045 (0.836)	0.008 (0.317)	0.005 (0.709)	0.018 (0.952)	0.004 (0.449)
<i>Member</i>	-0.054* (-2.123)	0.001 (0.017)	-0.059* (-2.164)	-0.049*** (-5.550)	-0.044 (-1.897)	-0.049*** (-5.148)
<i>Age</i>	-0.097 (-1.686)	-0.327* (-2.188)	-0.048+ (-0.773)	-0.016 (-0.844)	-0.066 (-1.360)	-0.006 (-0.262)
<i>Gender</i>	0.041 (1.359)	0.064 (0.808)	0.033 (1.022)	0.011 (1.002)	-0.025 (-0.859)	0.016 (1.396)
<i>GDP</i>	0.006 (0.880)	0.027 (1.300)	0.002 (0.355)	0.003 (1.400)	0.009 (1.197)	0.002 (1.003)
<i>Ind/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3.320	3.710	7.520	3.587	2.520	3.220
Adj R <sup>2</sup>	0.158	0.090	0.180	0.101	0.083	0.113
N	7594	1318	6276	7594	1318	6276
系数差异		0.186			0.075	
Chi2		12.770			14.520	
p-value		0.000			0.000	

注：+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8 是关于产权保护水平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 8 第 (1) 列、第 (4) 列中，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产权保护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地方产权保护水平显著削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以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在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样本组中，表 8 第 (2) 列、第 (5) 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

值系数分别为 0.072 (5%水平上显著) 和 0.014 (不显著)。在产权保护水平较差的样本组中，表 8 第 (3) 列、第 (6) 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096 和 0.045 (分别在 1%和 0.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关系，在产权保护水平较差的地区中更为显著，假设 5 得到验证。

表 8 产权保护制度的影响

变量	(1) FCP1 全样本	(2) FCP1 Property = 1	(3) FCP1 Property = 0	(4) FCP2 全样本	(5) FCP2 Property = 1	(6) FCP2 Property = 0
常数项	0.447* (1.970)	0.136 (0.440)	0.072 (0.234)	0.583*** (7.639)	0.543*** (5.240)	0.547*** (5.230)
<i>Rural</i>	0.395*** (3.747)	0.072* (2.009)	0.096** (2.985)	0.175*** (4.737)	0.014 (1.135)	0.045*** (4.042)
<i>Rural</i> × <i>Property</i>	-0.041** (-2.984)			-0.019*** (-3.874)		
<i>Property</i>	-0.066*** (-6.925)			-0.010** (-3.011)		
<i>Size</i>	-0.001 (-0.177)	0.002 (0.293)	-0.004 (-0.484)	-0.001 (-0.732)	0.005* (2.090)	-0.009*** (-3.476)
<i>Leverage</i>	1.091 (0.547)	1.536 (0.448)	0.323 (0.129)	-3.797*** (-5.342)	-4.272*** (-3.338)	-3.520*** (-4.094)
<i>Ros</i>	0.279 (1.268)	0.292 (1.059)	0.379 (0.995)	-0.218** (-2.919)	-0.250** (-2.664)	-0.114 (-0.915)
<i>Firm-Age</i>	-0.002 (-0.124)	-0.011 (-0.448)	-0.005 (-0.191)	0.012* (2.092)	0.009+ (1.113)	0.013 (1.634)
<i>PC_dum</i>	-0.005 (-0.236)	-0.030 (-0.953)	0.057 (1.775)	0.001 (0.176)	-0.017 (-1.493)	0.030** (2.812)
<i>Member</i>	-0.062* (-2.448)	-0.089* (-2.423)	-0.019 (-0.544)	-0.052*** (-5.863)	-0.043*** (-3.346)	-0.054*** (-4.390)
<i>Age</i>	-0.084 (-1.459)	-0.084 (-1.034)	-0.117 (-1.436)	-0.014 (-0.733)	-0.021 (-0.757)	-0.019 (-0.692)
<i>Gender</i>	0.047 (1.574)	0.034 (0.823)	0.047 (1.067)	0.011 (1.065)	0.000 (0.008)	0.021 (1.370)
<i>GDP</i>	0.029*** (4.281)	0.011+ (1.284)	0.001 (0.105)	0.008** (3.106)	0.004 (1.217)	0.005 (1.461)
<i>Ind/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7.350	4.370	9.760	4.760	4.970	4.450
Adj R <sup>2</sup>	0.169	0.104	0.109	0.105	0.121	0.092
N	7594	3725	3869	7594	3725	3869
系数差异		0.024			0.031	
Chi2		8.580			6.070	
p-value		0.003			0.014	

注：+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五、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一)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不同权力维度的影响

家族控制权涉及所有权、决策控制权和管

理权三个方面，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上述三种权力维度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所有权的估值系数为 0.042，在 0.1% 水平上显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Rural*) 与家族决策控制权的估值系数为 0.028，在 5% 水平上显

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管理权的估值系数为 0.022，不显著。

单纯从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影响最大，对家族管理权的影响最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原因可能是：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对企业家能否掌控企业存在差异化的影响。所有权是家族控制的核心层，代表着企业家或家族对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日常经营管理权的重要性相对较弱，即使将其委托给职业经理人，也并不会在实质上影响企业家或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同时又可以借助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提升企业经营水平。从现实来看，也确实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在不放弃所有权的同时，聘请职业经理人来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从而这一检验结果也符合客观实际。

表 9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所有权、决策控制权和管理权关系

变量	(1) <i>Equity</i>	(2) <i>Decision</i>	(3) <i>Manage</i>
常数项	0.362 *** (3.508)	0.592 *** (4.960)	0.671 *** (5.690)
<i>Rural</i>	0.042 *** (3.791)	0.028 * (2.157)	0.022 (1.720)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F	8.200	2.830	4.000
Adj R <sup>2</sup>	0.135	0.085	0.089
N	7594	7594	7594

注：+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二) 进一步检验

农村生活经历 (*ZQ*) 代表企业家有过一段

时间的农村生活经历，尤其个人从城市到农村具有较大的反差感。本文以农村生活经历（出生于 1961 年以前，且没有并存成长经历）为自变量，分别用全样本、城市企业家样本和有农村经历的企业家样本来检验农村生活经历对企业家控制权偏好的影响。其中，城市企业家样本是从全样本中删除了农村出身 (*Rural* = 1) 的样本，只剩下出身城市的企业家样本；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样本是从全样本中删除了城市出身但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样本，只剩下农村出身 (*Rural* = 1) 的和有农村生活经历 (*ZQ* = 1) 的企业家样本，而这两类企业家都是有农村经历的。

检验结果发现，全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ZQ*)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为 -0.025 和 -0.005，不显著。城市企业家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ZQ*)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为 0.070 和 0.022，均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对于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城市企业家，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控制权偏好更强。企业家青年时代在农村的经历给企业家心里留下了烙印，这种烙印影响力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有农村经历的企业家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ZQ*)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FCP1/FCP2*) 的估值系数为 -0.075 和 -0.019，分别在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对于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控制权偏好更弱。进一步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城市出身的企业家青年在农村生活时的经历虽然给企业家心里留下了烙印，但这种烙印的影响还是远远小于农村出身的企业家所受到的影响（见表 10）。

表 10 企业家农村生活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

变量	(1) <i>FCP1</i> 全样本	(2) <i>FCP1</i> 城市	(3) <i>FCP1</i> 农村经历	(4) <i>FCP2</i> 全样本	(5) <i>FCP2</i> 城市	(6) <i>FCP2</i> 农村经历
常数项	-0.298 (-1.003)	0.257 (0.639)	0.392 (0.854)	0.369*** (3.827)	0.494*** (3.751)	0.628*** (4.267)
<i>ZQ</i>	-0.025 (-0.841)	0.070 <sup>+</sup> (1.731)	-0.075* (-2.214)	-0.005 (-0.547)	0.022 <sup>+</sup> (1.652)	-0.019 <sup>+</sup> (-1.716)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6.310	5.86	8.87	5.99	4.86	9.36
Adj R <sup>2</sup>	0.070	0.090	0.066	0.072	0.089	0.069
N	7594	5336	4338	7594	5336	4338
系数差异		0.145			0.239	
Chi2		11.610			9.170	
p-value		0.000			0.003	

注：+p<0.1，\*p<0.05，\*\*p<0.01，\*\*\*p<0.001。

###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前述一系列检验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检验。一是调整了因变量的测度方式，对所有权的测度采用“企业家本人及其家人所持有的所有权比例”实际数值进行测量，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公因子代表家族控制权偏好程度（*FCP3*），重

新进行了检验 [见表 11 第（1）列]；二是考虑到女性企业家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干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为此删除了女性企业家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 [表 11 第（2）、第（3）列]。

表 11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i>FCP3</i>	<i>FCP1</i>	<i>FCP2</i>
	替换因变量	删除女性样本	
常数项	0.267 (1.117)	0.082 (0.349)	0.575*** (7.336)
<i>Rural</i>	0.062* (2.365)	0.104*** (4.150)	0.036*** (4.191)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F	6.700	6.460	6.170

续表

变量	(1)	(2)	(3)
	<i>FCP3</i>	<i>FCP1</i>	<i>FCP2</i>
	替换因变量		删除女性样本
Adj R <sup>2</sup>	0.089	0.146	0.091
N	7594	6646	6646

注: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 (四) 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和 PSM 倾向匹配得分方法进行检验 (因变量为 *FCP1*), 检验结果与前文

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见表 12)。在进行 Heckman 两阶段检验时, 本文采用统计年度行业内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满足相关性与排他性的要求。

表 12 Heckman 两阶段和 PSM (1:1)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Heckman ( <i>FCP1</i> )					PSM ( <i>FCP1</i> )				
常数项	-2.311 (-1.675)	-0.959* (-2.232)	-2.907* (-2.194)	-2.520+ (-1.901)	-2.369+ (-1.761)	-0.569+ (-1.685)	0.480*** (3.388)	0.584*** (4.114)	0.703*** (4.917)	0.708*** (4.731)
<i>Rural</i>	0.087*** (3.687)	0.053*** (4.759)	0.137*** (4.598)	0.308*** (4.996)	0.543*** (4.734)	0.107*** (3.398)	0.060*** (3.868)	0.050*** (3.794)	0.083** (3.003)	0.144** (2.806)
<i>Edu</i>		-0.086*** (-6.136)					-0.099*** (-4.092)			
<i>Rural</i> × <i>Edu</i>		-0.062*** (-3.791)					-0.063** (-2.745)			
<i>System</i>			-0.030 (-0.939)					0.009 (0.438)		
<i>Rural</i> × <i>System</i>			-0.162* (-2.518)					-0.066* (-2.363)		
<i>Market</i>				-0.156*** (-3.501)					-0.089*** (-3.538)	
<i>Rural</i> × <i>Market</i>				-0.249*** (-3.709)					-0.060* (-1.997)	
<i>Property</i>					-0.024* (-2.373)					-0.017** (-2.986)
<i>Rural</i> × <i>Property</i>					-0.058*** (-3.850)					-0.014* (-2.130)
<i>Lambda</i>	0.176*** (5.792)	0.291** (3.086)	0.622* (2.140)	0.585* (2.015)	0.541+ (1.843)					

续表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Heckman (FCPI)					PSM (FCPI)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7.920	8.480	7.750	8.320	8.040	3.630	4.130	3.540	4.730	3.890
Adj R <sup>2</sup>	0.158	0.168	0.160	0.164	0.162	0.161	0.176	0.163	0.173	0.171
N	7594	7594	7594	7594	7594	3269	3269	3269	3269	3269

注：+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六、结论与启示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控制权配置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企业家个人意志与企业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企业家成长经历是企业家在过去的亲身体验，影响其认知偏好的形成，进而会影响其成为企业家后的决策行为。本文依据烙印理论，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背景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尤其在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群体中，这种关系更显著。同时，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办的企业和产权保护较弱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偏好影响较大，对家族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的实践启示在于：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强化对企业高度家族化控制的现象并不只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适性现象。由于控制权偏好也容易导致家族企业决策过程中出现

“家长决策制”“一言堂”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决策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必要培养清醒的自我意识，认识到自身决策行为会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并对其保持警惕，以免影响企业长期发展。同时，在企业中选聘一些与自身经历存在差异的高管人员。用他们异质性的知识经验帮助企业从自身经历的“窠臼”中解脱出来，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本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经历和体制内工作经历能够弱化有农村经历的企业家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偏好。这说明接受现代有关管理知识的教育能够弱化企业家的家庭控制权偏好，从这个方面下手，则很可能会帮助推动相关家庭企业的家族化进程。另外，市场进程和地区产权保护能够弱化有农村经历的企业家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偏好。

本文的研究理论启示在于：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可能根植于其个体思维认知，且随其思维认知的变化而改变。之前的研究往往将企业家控制权偏好的来源解释为追求家族利益，并结合外部法律、制度环境或内部股权制衡等因素来解释家族控制权结构的变化。例如，陈德

球等(2013)认为家族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源于对家族利益的追求,且随着外部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的改善而减弱。然而,事实上,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不仅来源于对家族利益的追求,还可能根植于其个体思维认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由于早年长期的物质资源约束、宗族文化熏染和社会资本限制,形成了与周围物质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思维认知。处于经济、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对资源流失更加敏感,注重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和控制。然而,当外部物质环境和资源禀赋发生变化时,他们能够得到新的物质资源,接触到新的社会资本,学习到新的知识和经验。这将改变他们原有的思维认知,并形成新的控制权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长期处在这种物质匮乏的环境中,会培养出与环境相匹配的思维认知。这种思维认知并非短期内形成,而是从古代的农业社会延续下来的。这种思维认知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物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同时,处在相同环境中的个体之间会产生相似的思维认知,彼此认同,使这种思维认知更加固化。如果个体不能跳出这个阶层环境,那么这种思维认知还会代代相传;然而,如果个体跳出这个阶层环境,其思维认知又会随其所处物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改变。根据烙印理论,其最初在物质匮乏时期形成的对稀缺资源的“稀缺心态”和宗亲文化,还是会对其日后的管理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农村成长经历对企业家的影响来源于这种独特的农村文化意识,即对稀缺资源的保护和控制,以及强烈的宗亲文化。

本文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个体的家庭经济状况会影响其心理安全感,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受研究条件限制,本文没有区分企业家早年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未来有待于进一步通过实际调研进行研究。二是关于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的分析,背后所蕴含的是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引致的风险规避心理,本文通过产权保护水平等调节性变量的检验,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验证。但限于变量测量难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可能直接的作用路径没有完全反映出来。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寻找合适的测量风险规避的指标,以风险规避为中介变量,研究农村成长经历影响企业家控制权偏好的直接路径。三是本文采用的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的样本企业大多是未上市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网络爬虫,辅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出身情况,并采用上市公司样本进行重新检验,以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接受编辑:李炜文

收稿日期:2023年1月3日

接受日期:2023年8月11日

#### 作者简介

许为宾,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016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家族企业治理,曾经在《管理学报》《科研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陈叶,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曾经在《运筹与模糊

学》上发表论文1篇。

豆秋杰（通讯作者，E-mail: autumn\_7@126.com），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讲师，2020年6月毕业于贵州大学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曾经在《技术经济》等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

李欢，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曾经在《生产力研究》上发表论文1篇。

### 参考文献

[1] 陈德球、魏刚、肖泽忠：《法律制度效率、金融深化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2] 陈东：《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管理世界》，2015年第8期。

[3] 范晓光、吕鹏：《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阶层与同期群差异》，《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4] 韩亦、郑恩营：《组织印记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福利实践》，《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5] 何轩、马骏、朱丽娜、李新春：《制度变迁速度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配置——基于动态制度基础观的经验性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3期。

[6] 胡荣、胡康：《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7] 蓝发钦、郑玮、宋巨生：《公司控制权结构设计、“资本家”禀赋与企业家背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8]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6期。

[9] 连燕玲、张远飞、贺小刚、梅琳：《亲缘关系与家族控制权的配置机制及效率——基于制度环境的解释》，《财经研究》，2012年第4期。

[10] 刘宏伟、刘元芳：《论社会资本视域中的阶层关系和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1] 柳珊：《〈人民日报〉中私营企业主形象变迁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2] 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3] 潘越、翁若宇、纪翔阁、戴亦一：《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14] 钱爱民、吴春天：《股权制衡视角下的家族控制权结构演变研究》，《管理学报》，2023年第4期。

[15] 乔耀章、巩建青：《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以城市、乡村、市场与政府互动为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6] 权小锋、吴世农：《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年第4期。

[17] 汪建华：《参军：制度变迁下的社会分层与个体选择性流动》，《社会》，2011年第3期。

[18] 吴超鹏、薛南枝、张琦、吴世农：《家族主义文化、“去家族化”治理改革与公司绩效》，《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19] 解晓娜、李小平：《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年第4期。

[20] 辛杰：《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与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隐性消解》，《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9期。

[21] 徐富明、张慧、马红宇、邓颖、史燕伟、李

欧：《贫困问题：基于心理学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17 年第 8 期。

[22] 杨翠迎、汪润泉：《城市社会保障对城乡户籍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上海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 期。

[23] 于潇、Peter Ho：《非农业户籍会使人更幸福吗》，《统计研究》，2016 年第 1 期。

[24] 曾宪聚、林楷斌、张雅慧：《创始企业家身份演变、控制权配置与控制权私利的抑制——雷士照明控制权争夺案例的再剖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25] 张旺：《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公平的时代诉求》，《教育研究》，2012 年第 8 期。

[26] 赵武、梁智野、张沂娜、肖婷：《创新开放度、知识获取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科技管理研究》，2022 年第 20 期。

[27] 赵西亮：《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2 期。

[28] 郑红亮、吕建云：《中国私营经济发展 30 年：理论争鸣和改革探索》，《管理世界》，2008 年第 10 期。

[29] 郑家喜、蔡根女：《农村私营企业家家族化原因探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

[30] 邹立凯、宋丽红、王博：《世代效应：民营企业企业家群体的阶层地位变迁研究》，《经济管理》，2020 年第 4 期。

[31] Bandura, A. 1989. 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9): 1175.

[32] Cote, S. 2011. How social class shapes thoughts and actions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 43-71.

[33] Graham, J. R., Harvey, C. R., & Puri, M. 2015. Capital allocation and deleg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within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5 (1): 449-470.

[34] Han, Y., Zheng, E., & Xu, M. 2014. The influence from the past: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and firms' compliance with social insurance policie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2 (1): 65-77.

[35] Judge, W. Q., Douglas, T. J., & Kutan, A. M. 2008. Institutional anteceden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egitimacy.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 (4): 765-785.

[36] Kish - Gephart, J., & Campbell, J. T. 2015. You don't forget your Roots: The influence of CEO social class background on strategic risk t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 (6): 1614-1636.

[37] 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 (9): 642-656.

[38]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 Vishny, R. 2000.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58 (2): 3-27.

[39] Li, J. J., Poppo, L., & Zhou, K. Z. 2008. Do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 always produce value?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domestic vs. foreign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9 (4): 383-400.

[40] Marquis, C., & Tilcsik, A. 2013.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 (1): 195-245.

[41] Mcevily, B., Jaffee, J., & Tortoriello, M. 2012. Not all bridging ties are equal: Network imprinting and firm growth in the nashville legal industry, 1933 - 1978. *Organization Science*, 23 (2): 547-563.

[42] Schoar, B. A. 2006. The role of family in family firm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2): 73-96.

[43] Stephen, K., & Philip, K.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

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1251–1281.

[44] Tsao, C. , Chen, S. , & Lin, C. 2009. Founding-family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2 (4): 319–332.

[45] Villalonga, B. , & Amit, R. 2009. How are U. S. family firms controlled.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

(8): 3047–3091.

[46] Young, U. K. , & Salih, Z. O. 2014. Structuring corporate boards for wealth protection and/or wealth creation: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2 (3): 266–289.

# All Past Is Prelude: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 Rural Experience and Family Control Preference

(Weibin Xu<sup>1</sup> Ye Chen<sup>1</sup> Qiujie Dou<sup>2</sup> Huan Li<sup>1</sup>)

(1. 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2. School of Busines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 family businesses, entrepreneurs exhibit an innate preference for control rights as they are essential tools for creating value and generating profits.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legal efficiency, financial depth,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equity balance, influence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However, limited research has explored entrepreneurs'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based on their past experiences, particularly their rural upbringing. This study focuses on entrepreneurs with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and applies imprinting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rural upbringing on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Entrepreneurs play a pivotal role as the main shapers and navigators of family businesses, with their actions reflecting their individual will. Understanding entrepreneurs' individual will is crucial for uncovering the underlying factors driving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and their individual will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ir upbringing experiences. Early experiences have been found to have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individual preferences. While the term "entrepreneur" often evokes thoughts of a privileged group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the elevation of entrepreneurs' socioeconomic status might obscure the fact that not all entrepreneurs share the same early-life resource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To address these gaps and theoretical deficienc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entrepreneur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urban-rural system. The dual urban-rural system, unique to China, is a far-reaching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that reflects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individual cultural contex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sing data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onducted between 2002 and 2014,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entrepreneurs with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exhibit stronger preferences for family control rights, particularly among those lacking higher education or formal institutional work experience. Secondly,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on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is more pronounced for businesses established before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s establishment and in regions with weaker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hirdly, entrepreneur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ownership preferences within the family, while their influence on management rights preferences is relatively smalle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in several aspects: Firstly, it expa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Drawing on imprinting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on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logic underlying the transition from "entrepreneurs' individual will" to "enterprise power configuration behavior." Unlike short-term experiences that may quickly be replaced by new

one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are enduring and can shape entrepreneurs'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decision-making over time. By delving into the impact of these long-term experiences on entrepreneurs'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this study offers a novel deconstructive logic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s behind family business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Secondly, this study offers fresh insights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familial natur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By focusing on entrepreneur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reasons behind family-oriented tendencies in family businesses,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early-life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texts, and social capital. This research holds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familial natur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promoting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ng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s.

Thirdly,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eterogeneity within family businesses.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examines differences in control rights alloc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non-family enterprises,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heterogeneity arising from entrepreneurs' diverse upbringing experiences. By focusing on family businesses as a group, this study reveals differences in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due to variations in entrepreneur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on of differentiated control rights allocation behaviors among family businesses.

The study acknowledges certain limitations: Firstly, an individual's family economic status can influence their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Due to research constraints, this study does not differentiate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 early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Future research could conduct empirical studies to address this gap. Secondly,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and family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implies a risk-averse mentality induced by these experiences. While this study partially verifies this using moderating variables such as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levels, further research could explore more suitable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risk aversion and study the direct impact pathway of rural upbringing experiences on entrepreneurs' control rights preferences. Lastly, the study's sample primarily comprises non-listed companie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imiting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Future research could employ web scrap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the backgrounds of actual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 listed family businesses, using listed company samples for further validation and to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the study's findings.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dual system; imprinting theory; rural growth experience; family control preference